本版编辑：熊若愚
E-mail：m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389

新思想新实践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综述

□ 刘同舫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与新的历史条件，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推进到新境界。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阶段相比，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加强了“顶层设计”，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段性要求。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创新的理论作为实现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指导改革开放实践的顺利进行，最终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理论创新和实现目标的实践逻辑、实践创新的有机统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进一步回答了国家制度完善和国家治理体系推进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力回答和解决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怎么治理国家”的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为了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治国理政总方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灵活运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错综复杂问题时的宏观驾驭能力的飞跃，也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治理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能力自信。

围绕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完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根本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主要是为了理顺体制、机制、基本制度的关系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推动，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则是通过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公平正义，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逐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制度自信。

在当代社会主义发展观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继科学发展观之后的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形势提出的治本之策，是针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来的战略指引。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维度，提出“文化自信”新思想。文化自信的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仅是属于某个国家的文化现象，还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来说，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并不是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鉴别、吸收、拯救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焕发生机，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深厚的思想滋养，才能为建立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提供有利条件。繁荣当代中国文化事业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建立统一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最终增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方面，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在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中，党如何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提出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放松，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建立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实践。

创造性地提出符合时代潮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导向。当代人类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地球村，既有共同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诸如金融动荡、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当下和今后的时代潮流，是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之间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是中国首次提出的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安全格局的具有全球性的人类解放的战略构想。

大有笔潭

小圈子是个“美丽陷阱”

□ 张明

圈子文化由来已久，是破坏政治生态的顽症。直至今天，圈子文化仍以一种历史的惯性影响着少数从政者。

为什么小圈子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小圈子缔结的本质就是因利而聚、利益捆绑。一些人羡慕向往小圈子、千方百计加入小圈子，都是人生观、利益观出了问题，看中的是小圈子的利益增值功能，愚昧地以为加入小圈子就能以最小成本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小圈子真的会带来那么多的好处吗？的确，小圈子有时确实能给跟班的小弟带来圈外人得不到的短暂利益。但实际上，这种利益虚假而不真实、暂时而不长远。第一，小圈子的非正义性，注定了进圈子就要行走于违纪违法的边缘。从政者加入某个小圈子后，势必要以圈子的意志为意志，慢慢就会远离正义良知的精神高地、逾越党纪国法的行为底线，渐渐走上结党营私、利益输送、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的不归路。所以，党内决不允许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第二，小圈子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同盟关系终究是虚幻的。古人常说，以势相交，势倾则绝；以利相交，利穷则散。从近几年查处的石油帮、山西帮等案例看，都是一咬一大串、拔出萝卜带出泥。建立在利益交易基础上的小圈子终究是靠不住的，一旦出现问题，急于自保，避之不及，原本看似坚不可摧的同盟关系会瞬间崩塌。第三，小圈子的对抗性，增加了从政风险。之所以称之为小圈子是相对于圈外人而言。如果圈子文化盛行，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必然会出现若干个利益共同体。进入圈子后，就要共同承担整个圈子和其他成员的行为风险，个人的安全性其实并没有真正增加，反而危险性加大了。

必须看到，进小圈子，表面得利隐藏的是危险，眼前风光埋下的是祸根。所以，对于从政者而言，对待小圈子问题，必须做到：一是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干部是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干部，决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决不能无原则地顺从。二是必须要有理性的认知。透过虚妄看到本真，小圈子违反党纪党规，害人害己，败坏党风政风，破坏政治生态。三是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始终坚信党组织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力量，人民才是最稳固的靠山。只要自己踏踏实实付出辛勤的智慧和汗水，就一定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人民的认可。

从政者只有认清了小圈子的本来面目、认识到了小圈子的严重危害，才能远离这个“美丽的陷阱”，才能在从政道路上循正理、守正义、不逾矩、行致远。

（上接3版）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开始探索生态补偿制度。通过把生态价值纳入经济核算体系，激励生态保护、生态投资的服务供给，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推动企业从事绿色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以水污染治理为例，浙江不仅实现了上下游不同市县之间的互动，建立了源头水生态补偿、异地开发补偿、排污权交易等相关制度，而且率先尝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与安徽省合作，对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进行补偿，每年安排资金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出3亿元，浙皖两省各出1亿元。以两省交界处水域为考核标准，上游安徽提供水质优于基本标准的，由下游浙江对安徽给予补偿；劣于基本标准的，由安徽对浙江给予补偿。自从跨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新安江流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现在，浙江省所有市县都已实现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转移支付额度从2006年的2亿元提高到2014年的18亿元，至2014年省级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04亿元。浙江省提前消灭6500公里“垃圾河”。2014年，全省145个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98个，占67.5%。

绿色发展离不开全球治理。实现绿色发展的直接动因是全球范围的环境变化，比如气候问题。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制度、政策合作和集体行动。近些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清洁能源投资方面突飞猛进，风能、太阳能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装机容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电动汽车、LED更是频频出台激励政策。正如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艾瑞克·海茨所言，“中国现在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之内，居于着全球领袖的地位”。2015年12月，全球气候大会在巴黎举行，通过了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在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共合贸易区责任原则”，使得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资金问题得以解决。

厚植开放

中国的对外开放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的“请进来”阶段：打开国门，让外国资本和技术进来。首先进入中国大陆的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华人资本；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日本、韩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欧美资本也开始涌入。这些原始资本的进入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阶段是“接轨”概念指引下的开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加入世贸组织，来自WTO等国际组织的压力与国内的改革意愿互相结合，推动国内相关体制改革，与国际通行的体制“接轨”。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的“走出去”阶段。大量国企和一些民企开始走出去，在海外设厂、实施海外并购。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今天的中国需要更高层次的开放，继续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在“接轨”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在“接轨”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体系建设；“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

上海洋山港，海天无涯，一桥如线，将中国经济最敏感的触角伸向太平洋，每年1500万标箱集装箱在这里吞吐，成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这只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个缩影。自2013年9月自贸区挂牌成立以来，这块国家级试验田就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主动对接国际规则，以开放倒逼改革，引领整个经济棋局之“势”。设置“负面清单”，改外商投资核准制为备案制，“外商进入中国不用再‘打哑谜’了，投资信心一下子爆棚”；实行“境内关外”海关监管模式，优化工作流程，大幅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设立自由贸易账户系统，实行跨境人民币融资新政，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一项项新政吸引了大量的民企和跨国巨头落户自贸区。国际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库恩评价道：中国经济已进入新时期，需要各种新颖且更为精细的对外开放措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这样一个先锋之地，细致、新颖、便捷的新政策正在快速提升在此经商的好处。

如果说上海自贸区代表着新一轮“引进来”和“接轨”的话，那么中联重科的海外并购则是企业“走出去”的典范。

2015年12月22日，在美丽的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博尔扎诺，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LA-DURNER公司签约仪式隆重举行。近些年来，中联重科“出海”动作频频，通过在海外建立销售网络、海外并购、海外设厂等多种形式，加速全球资源整合，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锋。

2000年，中国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当时，走出去的大多是国有企业，而且是自发地、零散地走出去；现在，民营企业已经成为走出去的“半边天”。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多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亚非拉占绝对比重；现在，对发达经济体包括日本、美国、欧盟的投资快速增长。

2001年，当中联重科董事长第一次去意大利CIFA公司时，他是带着仰慕之情前往的：“人家有70多年历史，全球第三大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我们就像小学生”。2008年9月，中联重科对CIFA进行全资收购，一跃成为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老大。2012年，CIFA实现扭亏为盈，规模和盈利能力均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此次海外并购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典案例。

走出去，不仅是资本“走出去”，更有管理经验“走进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也是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过程。对此，中联重科体会颇深：“国际巨头在管理理念、技术资源、市场布局上都远远领先于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中联重科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才能不断拉近与领先者的距离，并实现超越”。

走出去的不仅仅有企业。近些年来，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任务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已经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名片。

2016年6月1日，联合国驻马里的维和部队遭到恐怖袭击，1名中国维和人员牺牲，5人受伤，这是中国自1990年参加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以来，中国维和部队牺牲的第11名烈士。在饱受战火摧残的伊拉克、在发生血腥战乱的利比里亚、在地震浩劫的海地、在南北内战持续数十年最终导致分裂的苏丹……都能看见中国维和军人的身影。26年来，中国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1万余人次。目前，共有2882名中国维和人员在刚果（金）、利比里亚、南苏丹、苏丹达尔富尔、黎巴嫩、马里、中东、西撒哈拉、科特迪瓦9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近年来，中国承担了联合国10.2%的维和经费，仅次于美国。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苏和说：“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贡献者。”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习近平“一带一路”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又将地球翻转了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已经沉睡了500年的欧亚大陆。“一带一路”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计划，不仅有助于提振中国经济，而且为沿线和周边国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视角。

推进共享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共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一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博得满堂喝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立志带领中国人民走共同富裕之路。

1955年毛泽东指出，“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

1992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今天，习近平提出共享发展理念：“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共享发展就是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决不允许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十八大以来，中共将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落实共享发展的理念。

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共享水平，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就业服务等方面努力实现全覆盖，尤其是要保障1亿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要“使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

坚持底线思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托住特殊困难人群的底，对他们进行特殊救助和扶持，‘守住他们生活的底线’；托住急需救助人群的底，帮助他们渡过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各种难关”。

通过精准扶贫，补齐短板，确保在“十三五”时期让7017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共享小康；

通过对口支援，帮助西藏、青海、新疆、甘肃等落后地区，共建小康社会。

对口支援可能是最有中国特色、也最能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一项制度安排。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工作方针。从那时起，先后有18个省市、17家中央企业和几十个中央部委对口援助西藏。20多年来，累计落实援藏资金260多亿元、项目8800多个，援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达6000多人。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放弃城市舒适的环境，扎根雪域高原，用他们的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帮助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共享发展。

共享发展的理念并不局限于国内。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将共享发展理念运用于国际事务之中的体现。

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的讲话，再一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回应当今世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平等、保护主义和缺乏动力。习近平呼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体系，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发展中国家能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习近平主持联合国南南合作圆桌会议并宣布，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领域、总计600个项目的援助支持，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倡导权利平等，反对霸权主义，与非洲各国的合作不附加任何额外的政治条件，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2015年12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在南非召开，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新时代”的主旨演讲。时任非盟轮值主席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激动地脱稿感言：“今天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一位伟大领导人，他代表着的国家曾经经历贫穷，深受殖民主义侵害，但从来没有殖民过非洲，而是给非洲带来了新生。中国正在做非洲期待殖民者做而殖民者未做的事。”他称习近平是“上帝赐予非洲的福星”。

穆加贝的激动是发自内心的。这是因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无私的，也是历史悠久的。

在毛泽东时代，1967年开始援建的坦赞铁路可以说是共享发展理念在国际领域中的一个象征；

在邓小平时代，中非合作从基础建设逐步向减贫、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环保、清洁能源等民生领域倾斜，而且基本覆盖非洲所有国家；

在此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中国将在未来三年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一揽子合作项目框架激起了非洲各国的强烈共鸣。

人类社会从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发展快点的国家应该帮助发展慢点的国家，先富带后富，共同发展，共享发展，一起走向共同富裕。